



浙江文獻集成

汪康年文集

〔上冊〕

〔清〕汪康年 著

汪林茂 編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浙江文献集成

汪康年文集

〔上册〕

〔清〕汪康年 著

汪林茂 编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汪康年文集 / (清)汪康年著;汪林茂編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80715-711-3

I. ①汪… II. ①汪… ②汪… III. ①汪康年(1860~1911)—文集 IV. ①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98087 號

汪康年文集

(全二冊)

[清]汪康年 著 汪林茂 編校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石英飛 陳小林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54.75

字 數 535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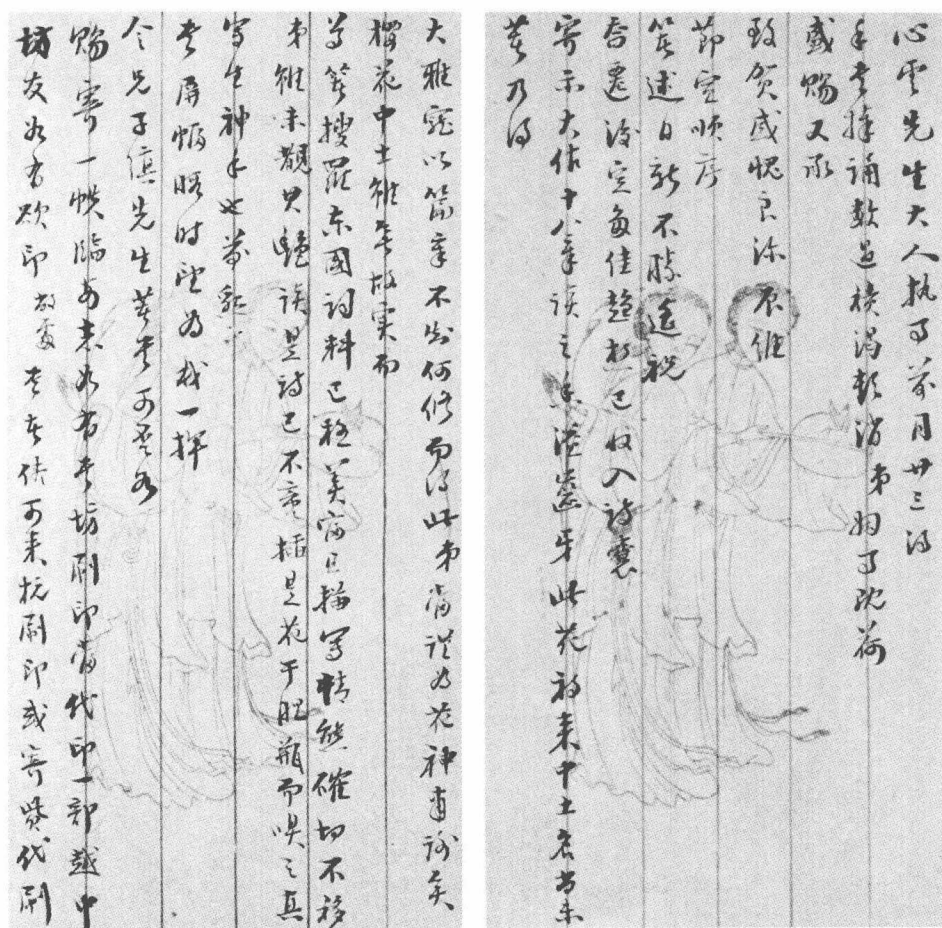
書 號 ISBN 978-7-80715-711-3

定 價 150.00 圓(平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汪康年像



汪康年書牘手迹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導委員會

主任 趙洪祝

副主任 夏寶龍

王輝忠

李 强

黃坤明

茅臨生

鄭繼偉

金德水

成 員

陳德榮

胡慶國

馬林雲

陳一新

胡 堅

金興盛

劉希平

錢巨炎

樂益民

楊建新

陳昆忠

陳 榮

林呂建

鄭倉元

童 健

蔣承勇

梅新林

許 江

張金如

李衛寧

孫文友

徐止平

孫建國

梁黎明

陳鐵雄

盧子躍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庫總序

2003.11

有人將文化比做一條來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來的河，這是說文化的傳統，通過縱向傳承和橫向傳遞，生生不息地影響和引領着人們的生存與發展；有人說文化是人類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載體、方式和方法，這是將文化作為人們代代相傳的生活方式的整體。我們說，文化為群體生活提供規範、方式與環境，文化通過傳承為社會進步發揮基礎作用，文化會促進或制約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文化的力量，已經深深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類文化演化的進程中，各種文化都在其內部生成眾多的元素、層次與類型，由此決定了文化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來源於其內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國文化的歷久彌新，取決於其變遷過程中各種元素、層次、類型在內容和結構上通過碰撞、解構、融合而產生的革故鼎新的強大動力。

中國土地廣袤、疆域遼闊，不同區域間因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等諸多方面的差

異，建構了不同的區域文化。區域文化如同百川歸海，共同匯聚成中國文化的大傳統，這種大傳統如同春風化雨，滲透於各種區域文化之中。在這個過程中，區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國文化的共同價值取向，以自己的獨特個性支撐着、引領着本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從區域文化入手，對一地文化的歷史與現狀展開全面、系統、扎實、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揚當地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資源，繁榮和豐富當代的先進文化建設活動，規劃和指導未來的文化發展藍圖，增強文化軟實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思想保證、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輿論力量；另一方面，這也是深入瞭解中國文化、研究中國文化、發展中國文化、創新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如今，區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視，成為我國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個重要標志。我們今天實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義也在於此。

千百年來，浙江人民積澱和傳承了一個底蘊深厚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的獨特性，正在於它令人驚嘆的富於創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於創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現在其歷史的源頭。在浙江新石器時代最為著名的跨湖橋、河姆渡、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們都以不同凡響的作為，在中華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創造和進步的印記。

浙江人民在與時俱進的歷史軌迹上一路走來，秉承富於創造力的文化傳統，這深深地融匯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體現在浙江人民的行為上，也在浙江歷史上衆多傑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從大禹的因勢利導、敬業治水，到勾踐的卧薪嘗膽、勵精圖治；從錢氏的保境安民、納土歸宋，到胡則的爲官一任、造福一方；從岳飛、于謙的精忠報國、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張蒼水的剛正不阿、以身殉國；從沈括的博學多識、精研深究，到竺可楨的科學救國、求是一生；無論是陳亮、葉適的經世致用，還是黃宗義的工商皆本；無論是王充、王陽明的批判、自覺，還是龔自珍、蔡元培的開明、開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蘊，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務實的創造精神。

代代相傳的文化創造的作爲和精神，從觀念、態度、行爲方式和價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發展了淵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傳統和與時俱進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發着浙江的創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競爭力，激勵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滿、永不停息，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斷地超越自我、創業奮進。

悠久深厚、意蘊豐富的浙江文化傳統，是歷史賜予我們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們開拓未來的豐富資源和不竭動力。黨的十六大以來推進浙江新發展的實踐，使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與國家實施改革開放大政方針相伴隨的浙江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深層原因，就在於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傳統與當今時代精神的有機結合，就在於發展先進生產力與

發展先進文化的有機結合。今後一個時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繼續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文化力量的深刻認識、對發展先進文化的高度自覺和對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們應該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終可以轉化為物質的力量，文化的軟實力最終可以轉化為經濟的硬實力。文化要素是綜合競爭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文化素質是領導者和勞動者的首要素質。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歷史與現狀，增強文化軟實力，為浙江的現代化建設服務，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業，也是浙江各級黨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責任。

二〇〇五年七月召開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屆八次全會，作出《關於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決定》，提出要從增強先進文化凝聚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增強社會公共服務能力入手，大力實施文明素質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護工程、文化產業促進工程、文化陣地工程、文化傳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項工程」，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衛生、體育等「四個強省」。作為文化建設「八項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務就是系統研究浙江文化的歷史成就和當代發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蘊、研究浙江現象、總結浙江經驗、指導浙江未來的發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將重點研究「今、古、人、文」四個方面，即圍繞浙江當代發展問題研究、浙江歷史文化專題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歷史文獻整理四大板塊，開展系統研究，出版系

列叢書。在研究內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蘊，系統梳理和分析浙江歷史文化的內部結構、變化規律和地域特色，堅持和發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與其他地域文化的異同，釐清浙江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響的關係；圍繞浙江生動的當代實踐，深入解讀浙江現象，總結浙江經驗，指導浙江發展。在研究力量上，通過課題組織、出版資助、重點研究基地建设、加強省內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門力量等途徑，形成上下聯動、學界互動的整體合力。在成果運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充分發揮其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諮政育人、服務社會的重要作用。

我們希望通過實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歷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經驗引領浙江人民，進一步激發浙江人民的無窮智慧和偉大創造能力，推動浙江實現又快又好發展。

今天，我們踏着來自歷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許，理應負起使命，至誠奉獻，讓我們的文化綿延不絕，讓我們的創造生生不息。

二〇〇六年五月三十日於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序

趙洪祝

浙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歷史悠久、人文薈萃，素稱『文物之邦』，從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從近代變革到當代發展，都為中華民族留下了衆多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勤勞智慧的浙江人民歷經千百年的傳承與創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質的基礎上，兼收并蓄外來文化的精華，形成了具有鮮明浙江特色、深厚歷史底蘊、豐富思想內涵的地域文化，這是浙江人民共同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結晶，是中華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這一文化瑰寶為我們所用、為時代服務，既是歷史傳承給我們的一項艱巨任務，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一項神聖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斷豐富、發展、創新浙江地域文化，對於進一步充實浙江文化的內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進一步增強浙江文化的創新能力、整體實力、綜合競爭力，進一步發揮文化在促進浙江經濟、政治和社會建設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浙江省委始終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早在一九九九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設文化大省的目標；二〇〇〇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設文化大省綱要》；二

〇〇五年，作出了《關於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決定》，經過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設『八項工程』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迄今為止國內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項目之一。該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會科學優勢學科為基礎，以浙江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現實課題和浙江歷史文化為研究重點，着重從『今、古、人、文』四個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傳承脈絡，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蘊，豐富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傳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學術影響和良好社會效益的學術成果，培養一支擁有高水平學科帶頭人的學術梯隊，建設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當代浙江學術』品牌，進一步繁榮和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提升浙江的文化軟實力，為浙江全面建設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正確的價值導向和有利的智力支持，為提升浙江文化影響力、豐富中華文化寶庫作出貢獻。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開展三年來，專家學者們潛心研究，善於思考，勇於創新，在浙江當代發展問題研究、浙江歷史文化專題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歷史文獻整理等諸多研究領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設立十餘個系列四百餘項研究課題，完成二百三十項課題研究，出版二百餘部學術專著，發表大量的學術論文，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這些階段性成果，對於加快建設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撐力和推動力。

黨的十七大突出強調了加強文化建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極端重要性，並對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作出了全面部署。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黨代會提出『創業富民、創新強省』總戰略，並堅持把建設先進文化作為推進創業創新的重要支撐。二〇〇八年六月，省委召開工作會議，對興起文化大省建設新高潮、推動浙江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進行專題部署，制定實施了《浙江省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綱要（二〇〇八至二〇一二）》，明確提出：今後一個時期我省興起文化大省建設新高潮、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主要任務是，在加快建設教育強省、科技強省、衛生強省、體育強省的同時，繼續深入實施文明素質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護工程、文化產業促進工程、文化陣地工程、文化傳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設『八項工程』，着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產業發展體系等『三大體系』，努力使我省文化發展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在文化建設方面繼續走在前列。

當前，浙江文化建設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既面臨千載難逢的機遇，也面對十分嚴峻的挑戰。如何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始終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發揮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們認真研究、不斷探索的重大新課題。我們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全面實施『創業富民、創新強省』總戰略，以更深刻的認識、更開闊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進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遇到的各

種新問題，努力回答幹部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努力形成一批有較高學術價值和社會效益的研究成果。

繼續推進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我們熱切地期待有更多的優秀成果問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實力，增強浙江文化的競爭力，擴大浙江文化的影響力。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日於杭州

前言

汪林茂

汪康年，初名灝年，字梁卿；後改名康年，字穰卿，中年自號毅伯、毅白、初官、醒醉生，晚年號恢伯。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生於杭州城一個經商致富的大家族中，幼年隨父在浙、贛、粵間奔波，一面在其父親的督導下讀書。一八八二年，汪康年父親病逝，作為長子的他不得不早早挑起養家的重擔，先後在杭州任書局分校、王文韶家坐館，同時繼續學業。他的勤奮學習，換來命運的轉機：繼一八八六年入錢塘縣學後，一八八九年考取八旗官學教習，同年秋中舉人，一八九二年成進士。一八九〇年，他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招，為其孫子授課。此後，又充任兩湖書院史學齋分教。一八九三年，湖北自強學堂正式成立，汪康年受張之洞之命任編輯，翻譯西學書籍。在湖北的六年時間裏，汪康年積累了人脉，積累了政治經驗，也積累了西學素養，奠定了他日後辦報論政、開展政治和社會活動的基礎。

一八九五年中國甲午戰敗，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分界綫，也是汪康年人生道路的轉折點——一八九五年，汪康年離開湖北到上海，參加了上海強學會及創辦《時務報》活動，結束了『依人作計』的人生階段，開始了報人、政論家、政治改革鼓吹者的人生歷程。

(一)

通讀汪康年的政論文、書信和雜文，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那個時代國家和民族所經歷的災難、坎坷和崎嶇，感受到汪康年這一代救國之士不斷探索前進以及這個探索前進過程中的失敗、成功和經驗教訓，更感受到汪康年對國家的一片摯愛之忱、忠誠之心。正是這種摯愛和忠誠，推動他時時關注國家局勢、時代風雲，并且把這種關注轉化為救國的思考和行動。因而汪康年的思想和行動，是追隨着中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起伏跌宕的時代潮流、變亂迭起的政治風雲而往前行進的，因而汪康年的思想、言論及行動也就顯現出這樣幾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是在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以前。

早在汪康年人張之洞幕『依人作計』的時期，就非常關注并擔憂國家的局勢和前途。在一八八四年致友人的信中，汪康年就對國家面臨的外患（『法和已成，而高麗又生枝節』）、內憂（『各省復有水旱偏災之聞』）之形勢，表達了『杞人之憂，何日能已』的心情（見本書第五八頁）。以下凡引文出自本書者，均僅標頁碼）。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失敗和《馬關條約》簽訂，對當時汪康年這一代知識人更是一個深深的刺激，原來就縈繞於心中的憂患意識更深重了，前此即已經從西學中有所瞭解的西方政治制度，在『島夷』打敗『天朝』的背景下越發彰顯了它的實踐價值，喪師割地的羞辱則更暴露出傳統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汪康年與友人或信函往